

史料性 可读性 权威性 教材性 收藏性

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始，使全国人民各条战线更深地陷入极左的深渊。直到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国才出现了转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中国历史大事详解近代卷

转机时刻

The Explain
in Detail
of Chinese
History



中国历史大事详解

30 杰 李梅 吴晓莉 苏继红/编著

1970~1979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历史大事详解

(近代卷)

转机时刻(1970-1979)

邓书杰 李梅 吴晓莉 苏继红 编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佩雄

封面设计:胡 艺

中国历史大事详解(近代卷)

转机时刻(1970 - 1979)

邓书杰 李 梅 吴晓莉 苏继红 编著

出 版: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880 × 1230 1/32
印 张:18 字数:24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4 月第一版 200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 - 1000
书 号:ISBN 7 - 80702 - 295 - 7

定 价:480.00 元(全 10 册) 本册定价:48.00 元

目 录

1970 年

“一打三反”运动的开展	2
全国计划会议拟定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	5
关于设国家主席之争	7
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1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13
“批陈整风”运动与华北会议	17
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	21
“文革”中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畸形发展	24
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	28
地方小型工业的迅速发展	32
毛泽东会见埃德加·斯诺	36

1971 年

《“571 工程”纪要》的制定与“联合舰队”的活动	40
保钓运动	47

毛泽东在南方视察	50
“九一三”事件与林彪集团的覆灭	55
“乒乓外交”	60
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	65
毛泽东纠正对外宣传中的错误提法	70
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恢复	73
两年经济冒进	78
60~70年代的援越抗美	82

1972 年

全国划会议讨论 1972 年计划及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	89
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	91
中共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	94
解放和使用一批老干部	96
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	100
周恩来关于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	101
周恩来纠“左”的努力及其中断	104
马王堆出土西汉早期墓葬	108
尼克松访华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112
田中角荣访华与中日建交	116
我国对外关系的新进展	120
湘黔铁路建成通车	125
李庆霖事件	127

1973 年

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与引进进口成套设备	131
全国划会议确定 1973 年经济计划和解决“三个突破”的措施	132
邓小平复出	134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乡工作会议	136
江青一伙在教育战线掀起“反潮流”、“反回潮”的恶浪	137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40
我国第一台每秒运算 100 万次的集成	143
教育战线批判孔子问题座谈会	145
童第周和牛满江在细胞遗传学基础理论的合作研究取得进展	146
根治海河取得巨大胜利	147
中央决定邓小平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149

1974 年

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	152
“批林批孔”运动	154
“评法批儒”恶浪的兴起	158
“四人帮”掀起的反“文艺黑线专政回潮”运动	160
毛泽东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	163
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	167
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建成	169
我国建成大港油田和胜利油田	171
全国抓革命促生产会议	172
“风庆轮事件”	174

长沙诬告与“四人帮”组阁阴谋的破产	177
全国掀起宣传、学习朝农经验的浪潮	181

1975 年

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	185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	189
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	193
特赦全部在押战犯和宽大释放美蒋特务	201
张志新被夸事件	204
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	209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211
评《水浒》运动	215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219

1976 年

教育革命大辩论	227
全国人民沉痛哀悼周恩来	230
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	233
吉林省降落世界罕见的陨石雨	236
四五运动	237
唐山大地震	241
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	244
举国哀悼毛泽东	248
“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	252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256

粉碎上海反革命武装暴乱计划	260
全国人民揭批“四人帮”	263

1977 年

批评与抵制“两个凡是”	270
国民经济“大干快上”	272
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各项职务	275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281
毛主席纪念堂落成	285
恢复和发展党校教育工作	287
恢复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	291

1978 年

平反冤假错案	295
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298
政协、民主党派活动的恢复	299
全国科学大会召开	303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307
越南驱赶华侨事件	311
中共中央发布《工业 30 条》	317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319
落实干部政策	325
国务院召开务虚会	328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330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333

天安门事件平反	338
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	340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344
安徽农村的改革实验	348
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	352
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354

1979 年

中美建交	358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恢复	363
为四类分子摘帽	367
邓小平访美	369
对越自卫反击战	373
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378
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与重申	382
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387
价格、商业、财政体制的初步改革	391
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	394
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400
中国文联四大召开	403
台湾高雄事件	407
大事记	410

1970 年

1970 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五个年头，按毛泽东的估计，通过前几年的大乱应该达到“大治”以“圆满结束”这场革命。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林彪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挑起了事端。

3 月，毛泽东认为经过前一阶段的整党建党、清理阶级队伍，这时的重点应该是重建政府了，遂提出修改宪法和准备召开四届人大，并 6 次提到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之事。但林彪一意孤行，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为此同江青集团的矛盾也日益尖锐。8 月 31 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给林彪一伙以沉重打击。因此，可以说，九届二中全会是林彪集团由发展到覆亡的转折点。但它不甘心失败，以林立果为首的一批效忠林彪的人组成“联合舰队”，开始策划武装政变阴谋。

1970 年的经济发展较快，不仅比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而且超过了 1966 年的水平。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25.7%。一些重大工程项目和科技项目取得了成就。4 月 24 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我国在宇航技术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突破。7 月 1 日，全长 1083 公里的成昆铁路建成通车。这一切表明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竭力抵制和克服“文革”的严重干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贡献，也说明了搞经济建设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可是，由于“左”倾方针的影响，经济工作也出现了大的失误。在 2 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拟定了 1970 年计划和“四五”计划纲要（草案）。会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把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作为“四五”计划的重点，结果又出现盲目追求高指标，开始了

新的经济冒进，造成我国国民经济“三个突破”的严重局面。加上从3月起下放企业、精简管理机构、合并部委、下放大批技术干部，更加剧了经济工作的混乱。

“一打三反”运动的开展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这3个文件相继发出后，全国随即开展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的群众性运动。简称“一打三反”运动。

《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认为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是：“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加紧进行破坏活动。”他们“虽是一小撮，但无恶不做，危害很大”。“对反革命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指示》提出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方针是：（1）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清查、批判，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2）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3）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

盾，分清敌我，区分轻重。（4）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不论是杀、是关、是管，都要搞得很准，必须罪证确凿，判处得当；都要交给群众批判、斗争，把它斗倒斗臭。（5）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6）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该《指示》发出后，打击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但由于对形势估量过于严重和“左”的思想指导，也打击了大量无辜群众，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张志新所谓“现行反革命”案（被处死）便是其中一例。

1969 年左右，不少群众向中央办公厅信访处反映，有些单位存在着严重铺张浪费的现象。中央办公厅信访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1969 年第 68 期刊登了部分群众的来信。中共中央于 1970 年 2 月 5 日转发了这期简报以及广西自治区革委会关于柳州市搞非生产性建筑的调查报告，同时加了批示，即《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通知》指出：“坚持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是关系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坚决刹住这股资产阶级歪风。”为此，《通知》重申：（1）“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已施工的要一律停下来”，“重新制定施工计划”。（2）“任何地方不许兴建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工程，不许随意拆迁房屋。”（3）“一切新建、扩建企业和‘五七’干校，应当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一切非生产性建筑和生活设施必须从简，提倡延安精神。”（4）“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一律停止添置非生产性设备，必要时由内部调剂解决。确需购置的，地方经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军队经军以上党委批准。”（5）“严禁用公款请客、送礼、看戏、看电影。不要搞不必要的庆祝活动。”（6）“违

反上述规定，继续铺张浪费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行政处分，十分严重的要给予刑事处罚。”（7）“严格遵守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节约开支。”《通知》下发后，全国随即开展了反对铺张浪费运动，成为“一打三反”运动的组成部分。

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指示》指出，“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向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这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必须把这场斗争看作如同打击现行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违法犯罪事件，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至枪毙一小撮最严重的贪污盗窃犯和投机倒把犯。”中央的指示要求：（1）各地要根据斗、批、改的发展情况，全面规划，具体部署，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场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2）要自始至终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使广大群众擦亮眼睛，及时地识破他们，抵制他们，揭露他们。（3）要实行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4）要通过这场斗争，认真整顿财贸队伍。为了杜绝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中央的指示重申：（1）除了国营商业、合作商业和有证商贩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2）集市管理必须加强，一切按照规定不许上市的商品，一律不准上市。（3）除了经过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以外，任何单位，一律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不准以协作为名，以物易物。不准走“后门”。（4）一切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必须坚决取缔。（5）“一切单位的经营管理和群众监督必须加强，建立与健全规章制度，严格财经纪律，堵塞漏洞。”反对贪污盗窃，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是必要的、正确的，惩治了一些贪污盗窃犯罪分子，是应该的。问题在于政策界限不十分清楚，有些地方把一些正当的贩运和商业活动也当作投机倒

把加以打击，在反贪污盗窃中，不注意政策，搞逼供信，也造成了一些冤案。

全国计划会议拟定第四个 五年计划纲要（草案）

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的编制从1970年2月开始着手进行。由于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十分艰难。

我国国民经济在1967年、1968年连续两年出现倒退的趋势，1969年逐渐恢复秩序，1970年开始发展。1970年2月15日～3月21日，国务院主持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制定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拟定《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当时，由于对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分析，认为新的世界大战随时有可能爆发，把对付国外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大规模入侵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由于有了1969年的经济回升，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左”倾思想再度抬头。这次会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强调要“集中力量建设三线战略后方”。这些思想和情绪，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中。

第四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主要指标是：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2.5%，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合计1200亿元～1300亿元。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830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4000亿元，农业总产值830亿元；粮食达到3000亿公斤～3250亿公斤，棉花6500万担～7000万担；钢3500万吨～4000万吨，生产能力达到4000万吨以上；原煤4亿吨～4.3亿吨；原油7000万吨～10000万吨；发电量2000亿度～2200亿度；铁路货运量9亿吨～10亿吨。计划纲要（草案）的主要内容是：（1）高速度发展钢铁工业。布局、品种和数量同时并举，大办钢铁。

到 1975 年，东北、华北、华东、中原和西南经济协作区钢的生产能力都将达到 600 万吨以上；各省、自治区都要有一批中、小钢铁企业，一些地、县也要建立起自己的小矿山、小铁矿、小钢厂，形成大中小结合，星罗棋布的钢铁工业布局。（2）集中力量建成内地战略后方。到 1975 年，将内地建成一个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战略后方。内地工业建设在布局上，大分散、小集中，不搞大城市；工厂布点“靠山、分散、隐蔽”，特殊、重要工厂的关键设备或车间，有的“进洞”。打人民战争，建成一部分，投产一部分。实行土洋并举，设备能新则新，有旧用旧，土法上马，因陋就简。（3）将全国划分为西南、西北、中原、华南、华东、华北、东北、山东、闽赣、新疆 10 个经济协作区，在每个协作区内逐步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其中，山东、闽赣、新疆要建成“小而全”的经济体系；特别是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冶金、国防、机械、燃料、动力、化学等工业部门，同时建设比较强大的农业、轻工业和比较发达的交通运输业。（4）农业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粮食不足的省、自治区要尽快做到粮食、油料自给有余，扭转“南粮北调”的状况。到 1975 年，按农业人口平均每人达到一亩高产稳产农田，耕作机械化程度达到 40%~50%。（5）大力发展地方“五小”工业。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建立小煤矿、小钢铁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和小机械厂等，形成为农业服务的地方工业体系。力争在一两年内，把每个县的农机修造厂都建立起来；三五年内做到每个公社和有条件的大队都有修配站。（6）加速发展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工业，积极改变燃料构成。到 1975 年，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工业在我国燃料动力结构中的比重，由 1969 年的 17% 提高到 31%~38%，煤炭的比重由 83% 降低到 69%~62%。要在江南地区多搞小煤矿，扭转“北煤南运”状况，力争到 1972 年江南各省、自治区实现煤炭自给。（7）大家动手办机械工业，各行各业都要自己武装自

己；大多数省、市、自治区要逐步做到能够成套地提供单机、机组和车间、工厂所需要的设备；机械工业要把国防、军工和内地建设所需设备的生产放在首位。（8）除了少数轻工产品由于受资源条件限制，需要由国家统一调配外，一般轻工业产品都要根据各自的条件，尽可能做到省、自治区自给。

1970年8月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中央将作了部分修改的《纲要（草案）》作为参考文件在会议上印发。1971年3月，中央将此《纲要（草案）》中主要指标作为1971年计划的附件下发。由于当时国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加之计划本身也存在问题，所以第四个五年计划始终未能形成完整的国民经济计划下发。

第四个五年计划依然存在着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弊病，片面强调多积累，过分突出建设重工业，一味追求生产上的高指标，而忽视了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实际。对此，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采取了积极措施加以控制，调整了“四五”计划纲要。由于原订计划指标过高，难以实现，1973年进行调整，提出《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修正草案）》，对奋斗目标有所降低，控制基建规模，加强劳动工资管理，减少粮油购销差额。这些努力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有了好转。但由于“文化大革命”仍在进行，江青一伙不断干扰破坏，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无法彻底纠正，经济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1975年，按《纲要（修正草案）》检查计划执行的结果：工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101.7%，其中农业总产值完成104.5%，工业总产值完成100.6%，一些主要产品的产量，如棉花、棉纱、钢及铁路货运量等均未完成计划。

关于设国家主席之争

1969年九大之后，鉴于党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基本恢复，毛泽东进一步考虑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转问题。1970年3月8日，他在武汉让汪东兴回京向政治局传达他关于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以及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3月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赞成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始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16日，政治局就修改宪法的一些原则问题，向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毛泽东批阅了这个报告。3月17日至20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到会的人中有两种意见：一部分提出还是要设主席，并请毛泽东继续担任此职。多数人赞成毛泽东事先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双方争论得很激烈。

林彪、叶群赞成设国家主席。3月9日，叶群给黄永胜、吴法宪打电话，告诉他们“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林彪还亲自给毛泽东打电话，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4月11日，林彪正式向政治局提出要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认为“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人民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符合人民的心理状态”。林彪还表示自己不适应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4月1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关于林彪意见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4月下旬，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第三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毛泽东这种以个人专断改变国家体制的做法虽然是不正常的，但在当时林彪、江青集团已控制了国家较多权力的情况下，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在客观上起到了不使更大权力落入他们手中的作用。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会议期间，毛